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一九期 ——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311c)

【亡灵祭坛】	相差四十五年去世的孙历生和于光远	王友琴
【史海钩沉】	中苏“十年论战”是文革的舆论准备	吴兴唐
【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 (选载之十五)	孙怒涛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亡灵祭坛】

相差四十五年去世的孙历生和于光远

• 王友琴 •

1、“悲怆”的涵义

“孙历生”，是我的《文革受难者》书（2004年出版）中659名人物之一。孙历生的生平简述如下。

她生于1934年，1949年时是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学生，毕业留校当了该校的政治教员。1957年她在党校学习时被划成“右派分子”。她被送去劳改农场劳动，那是对“右派分子”的惩罚。她很年轻时和一名高级干部结婚，成为“右派分子”后丈夫和她离婚，他们的三个孩子在她母亲家里养大。她在劳动三年后在1961年底“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回到女三中，先做体力劳动，后到资料室工作。她和一名也是“右派分子”的中学教员聂宝珣结婚，又生了一个女儿。1966年文革开始，她再次遭到“斗争”和迫害。女三中建立了两个校园“劳改队”，她和校中另外三个“摘帽右派”都在“第二劳改队”中。红卫兵用细铁丝在她脖子上挂四块砖头，强迫她和一些老师在玻璃碴上爬行。1966年8月20日上午，该校校长沙坪在全校“斗争会”上打死，当时她也和沙坪跪在一起被打。她的母亲因有自己的住房，被红卫兵抄家剃头并殴打。她也被红卫兵抓到她母亲家中一起挨打。1966年夏天该校校长被打死，

两名教员被抄家殴打后“自杀”身亡。孙历生活了下来。1968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她被关在学校“审查”。7月11日晚她跪在地上遭到“斗争”，该校“革命委员会”主任董光苔宣布她是“没改造好的右派”，将在第二天下午开全校大会给她“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第二天中午有人报告孙历生吊死在一个废弃的厕所中。学校“革命委员会”宣布她“自杀”。因为不见她的遗书，而且文革后银行发现她留下一张数额不小的存单始终无人认领，她的母亲和女儿一直怀疑她是被打死后吊起来的。她死的时候34岁，四个未成年的女儿中最小的七岁。

这就是孙历生的“悲怆的人生故事”。我想，一方面，大概很难找到更合适的形容词来形容孙历生的人生了。但是另一方面，读者大概也会同意，也只有了解她的具体的遭遇，才能真懂得所谓“悲怆”到底是怎样的状况。而且，其中不仅有她生前的遭遇，还有她死后遭到的论说以及不被论说。

2、“否认”受难者

于光远就是孙历生的离了婚的丈夫。最近北京的报纸介绍他是“原中顾委委员，原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著名社会科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

其实我的书稿本没有写出于光远的名字。这样做的道理是，孙历生的悲惨遭遇中，虽然也有传统戏剧表现过的“秦香莲”和“陈世美”的因素，也就是妻子被有势或有钱的男人抛弃的成分在内，但是从主要的方面说，她的命运主要是“反右派”和“文革”这两场大“运动”也就是两场大迫害造成的。我尽可能地了解孙历生和她的同事遭到了什么样的折磨。这些调查的结果，写在书中和《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等文章中。被“劳改”，受酷刑，惨死于校园中，那不只是孙历生一个人的命运，而是上百万教育工作者和其他指定的打击对象成为“受难者”的共同命运。她经历的是前所未有的名为“革命”的大规模的群体性的迫害，传统的男女两性的不平等在其中的作用是其次。

编辑《文革受难者》书稿的时候，在“孙历生”中的一处加入了“于光远”的名字。这也的道理。写一个历史上的人物，需要介绍姓名年龄出生地职业等等以显示真实性，其家庭和社会关系也是一个方面。何况于光远确实属于所谓“公众人物”，可以写到。

后来，2009年，在北京的一个国际文学会议上，我的发言是对比小说人物和其原型，以王蒙的《蝴蝶》为例。发言后一名美国教授提问：你怎么能证明你说的受难者是真的？其时，孙历生和其他几名中学教师受难者的照片等资料刚在大屏幕上显示过。会后有人跟我说：你应该请这位教授马上给于光远或王蒙打电话，他们两人总不能说孙历生是你编造出来的人吧。

看来，为了显示孙历生的真实存在，真需要提到她曾经的知名丈夫。不过，提出那种问题的背景是，一些西方和国内的教授要正面评价文革，提出毛泽东时代是“道德的时代”。显而易见，孙历生等受难者的“悲怆”故事会使得他们的“理论”无法成立。之前，已经有过文革的施害者矢口否认受难者存在。后来还有为了捍卫自己拥护文革的理论的人也来参与这种“否认”。二十世纪发生的迫害和屠杀，希特勒的大屠杀，斯大林的大清洗，都有过“否认者”(deniers)。这些年，随着中国大饥荒和文革的千万受难者被揭露，就出现了对中国人受难惨状的“否认者”。

3、王蒙用庄子化解迫害

《文革受难者》书中关于孙历生有11页的描述，是经过数年调查才写成的。北京大学郑培蒂老师是孙历生在女三中教过的学生，在采访中告诉我孙历生曾是由于光远的妻子，王蒙的邻居，也是王蒙小说《蝴蝶》中人物“海云”的原型。她记着孙历生教学生唱歌的美好形象。原

型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方法之一。多少年来，学者和文学爱好者下功夫研究难以考察的莎士比亚和曹雪芹的生平，想从他们的生平中找到他们的作品的原型，对作品作出更深的解释。《蝴蝶》是文革后文学的著名作品，我又碰巧调查了解了孙历生的生平和死亡，可做有关研究。孙历生和王蒙小时候都住在北京西四小绒线胡同自家的房子里，小学一年级就在一个班读书，都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1957年都当了“右派分子”。《蝴蝶》是小说，裁剪原型的事实是应有的手段，不过，从取舍和改动之中，可以看出作者的用意。孙历生被离婚时已经有三个孩子，是“组织”要求离婚的。《蝴蝶》中“海云”只有一个孩子，成“右派”后主动要求和高级干部丈夫离婚。“组织”逼迫离婚是广泛使用的迫害手段，有三个孩子的“右派分子”妻子首先提出离婚太难被读者相信，改成一个孩子是很聪明的做法。孙历生在文革中受到残酷折磨，小说则没有写。看来是为了配合另一篇同时发表的《布礼》（“布尔什维克的敬礼”的缩写）中主人公对迫害的看法：“父母打错了孩子孩子不应该记恨”。因为大家知道，父母如果用残酷手法打死了孩子，也是要判重罪的。

王蒙聪明，他对原型人物的实事的改动确实有助于他对文革迫害所作的解释。此外，他还用了庄子哲学，《蝴蝶》篇名就来自庄子最有名的“梦蝶”的故事。庄子对人生的看法超然潇洒。在庄子看来，生死如白天和黑夜交替，物质财富是身外之物。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说法。但是，不会有人愚蠢到想用庄子哲学为杀人犯和盗窃犯辩护说，既然“生死齐一”，物质财富也不重要，就不必对他们判罪和惩罚。文革后一段时间时髦说老子庄子哲学，如《蝴蝶》所作，当时有人私下说这是故弄玄虚滑过审查以求发表，而王蒙正善于此道。但是，今天孙历生已经被迫害死亡45年多了，王蒙也写了好几本非虚构作品，他的自传写了他生平种种大小事情，甚至也简单提到了孙历生，但是，他从未详述孙历生的悲惨遭遇。

于光远去世两周后，是王蒙的八十岁生日。在一篇介绍其生日庆祝的文章中（胡新民：王蒙在文革中是怎样挨整的？《共识网》），讲述为什么王蒙在文革中“一直平安”，引述了他们夫妇的话，是因为他们“一贯谦虚谨慎”，“听毛主席教导”，“向农民学习”。该文作者用的是直接引文。从三十年前写《蝴蝶》到现在，王蒙的认识又进了一层？他炫耀他的明哲保身诀窍的同时，也在暗示受难者们都是因不“谦虚谨慎”而遭难的吗？

4、于光远的回避

十年以前，我已经了解到孙历生在文革惨死，却没能找到她的死亡日期。档案中显然会有记载，但是要认识人才可能查到。所以这只有找到她的家人才能知道。我试了各种办法没有结果，最后，只有给于光远写了信。他没有回信。我在做受难者调查的时候，也曾给另外几名地位和他相仿或者更高的人写过信。因为他们的名声和地位，收信地址不会错，他们也肯定收到的。但是他们都没有回信，和我写过信的普通人中的回信率形成对比。但是，于光远的女儿收到了我手写的信的传真件。传真件上没有任何附加的说明。她不知道是她父亲还是父亲的秘书或者别的人把我的信传真给她的。她和我联络，我才知道了孙历生的遇害日期。

文革后，1978年，孙历生的女儿们为母亲举行了追悼会。她们发出了一百张请帖，到会的有几百人，多是中学老师。其中有当时已经80岁的孙历生小时候的老师，也有和她一样在文革中惨遭殴打折磨的教师。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校长高云遭毒打后失去知觉，被红卫兵送去火葬场。火葬场的工人发现他还有气，没有烧他。他的两个同事姜培良和靳振宇都在1966年8月25日被打死了。高云在追悼会后还来看望孙历生的孩子，希望帮助他们。于光远没有出席孙历生的追悼会。

于光远的女儿说，多少年来，为孙历生的死，只有一个人表示过歉意，是陆定一。陆定一是文革前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也是文革中最早被“打倒”的四个高级干部“彭

罗陆杨”四人中的一个。孙历生被划成“右派分子”，原因之一是说了批评他的话。陆定一为孙历生之死向孙历生的孩子道歉。这个道歉和陆定一说宣传部多少年来做的“就是整了这个整那个”一样，没有得到过正式的发表。

于光远自己在文革中遭到“斗争”，被抄家，被从原来的住房中逐出。这些都在他1993年出版的书《文革中的我》中有记叙。那本书里没有提到孙历生。孙历生的女儿还向我指出，书中有专章讲述他的孩子，但是只写在孙历生之后的婚姻所生的孩子，没有提起孙历生的孩子，尽管书中写到的有些事情她也在场。于光远有五个女儿。其实对外人来说，根本没有人知道他写到的孩子哪一个出自孙历生。他的这种刻意的小心的回避，也许也体现了他内心的一种紧张？说明他是在有意回避而不是简单的忘记？

在追念于光远的报道中，提到他晚年写作很多，出版了“近百本书”，还留下了写作用剩的两千多个铅笔头。这铅笔头收藏是很生动的关于一个高寿笔勤多产的作者的情节。但是也会令人问：为什么他从来没有写到孙历生？崇高的社会地位，98岁的高龄，应该是一个可以谈论人生所有经历的年龄了，他为什么还要回避？他要回避的究竟是什么？

反右派，文革，中国人遭到的迫害和荼毒，规模之大，手段之多，史无前例。中国有长久的学校和教育传统。前现代的精神导师孔子就是两千多年前的一名教师。文革中，连女子中学的校长教员都被学生红卫兵打死。我调查过北京的十所女子中学，其中有三名校长和两名教员被女红卫兵学生活活打死。其中有孙历生所在的北京女三中校长沙坪，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女十五中校长梁光琪，女十中教员孙迪，女四中教员齐惠芹。这既不能从传统也不能从现实中找到任何借口。王蒙写小说可以在庄子哲学的云里雾里侃上一气，于光远作为“社会科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很难这样扯。显然，曾经是他最亲近的人的孙历生的遭遇，使他无法解释也无法自洽，只有回避。

在八十年代，王蒙是“重放的鲜花”之一（这是一本当时得到平反后复出的作家的文集的书名），以后则地位和影响越来越大，行政职务做到文化部长。而于光远，也是“享受了30年自由派的尊敬”。但是，在孙历生的故事前，他们只是交了白卷或者半白卷。

5、陈寿仁老师的光辉

我很遗憾，《文革受难者》出版数年之后，我才认识了女三中的退休教员陈寿仁老师。她居然通过电子邮件找到了我，她的电脑技术在她的同龄人中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陈老师1954年在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北京女三中，和孙历生在一个教研室。1957年，陈老师的丈夫，也是中学教员，被划成“右派分子”，减薪去教职。他们夫妇忍辱负重带着三个孩子生活。文革中陈老师也被“揪”出来，和孙历生同在该校的“劳改二队”中。1966年8月18日，北京第一个打死校长的学校的红卫兵宋彬彬在天安门的百万人集会上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对她说了“要武嘛。”第二天，在女三中，红卫兵开始殴打折磨校长沙坪，直到深夜。8月20日上午，全校大会“斗争”“牛鬼蛇神”，沙坪在会上被打死。毒打沙坪的时候，孙历生和陈寿仁等老师也都跪在沙坪旁边挨了打。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陈老师也和孙历生都被关在学校里“隔离审查”。他们是“难友”。

和王蒙和于光远不同，陈寿仁老师既不是名人也不是大官，但是她坚持真理守护良心。她不为名利也不为出版（因为不能），做了仔细的回忆和调查，写出了女三中文革的全貌和所有被侮辱被折磨被“斗争”直至被杀害的人的名字和故事电邮给我。

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学，1966年，红卫兵高潮的“红八月”中，校长沙坪被打死。数学

老师张梅岩和体育老师何瑾被抄家侮辱后“自杀”。我在这里加上引号，因为即使他们确实是自己了断了自己的生命，也绝不是平常意义上所说的“自杀”。在该校校内，还有一个不知姓名的男人，红卫兵说是“老地主”，被活活打死。红卫兵还毒打和逼迫学校对门一个住户马宝山的妻子在他们面前吊死。她是七个孩子的妈妈，被说成是“破鞋”。

1968年，学校“革命委员会”领导进行“清理阶级队伍”和“斗批改”。一批老师被作为“特务”“现行反革命”遭到关押和“斗争”。所谓“特务”，根本就是没有的事。所谓“现行反革命”，是一位体育老师在家中做完针线活后，顺手将针别到贴在墙上的报纸上的毛泽东照片的空白边上。

在孙历生去世前，化学老师方婷芝也被关在学校，她被说成是国民党“特务”。6月11日晚上宣布第二天下午要对她召开全校“斗争大会”。12日中午她端着一个茶缸走出校门穿过马路时被13路公共汽车撞死。“革命委员会”宣布她“畏罪自杀”。陈寿仁老师认为方婷芝并非自杀，是因为神经紧张一夜未睡而出了事。但是方婷芝的丈夫钢铁学院教授高诒善先生知道方婷芝的死讯后，于第三天（6月15日）真的自杀了。家破人亡。

陈寿仁老师说，在孙历生死前的晚上，在校中东配殿（该校原来是帝王庙）最北端的教室里，召开了教职员工的质问会。陈老师也在会上。孙历生跪在地上，被指控为“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结束时，“革命委员会”主任双手叉腰，宣布要在第二天下午召开全校大会，给孙历生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第二天中午，陈老师和一起被关的同事不见孙历生来吃午饭。后来他们听说她吊死在厕所里。

盛荃生老师1957年时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药眠的研究生和助手。他和黄教授都被划成“右派分子”。文革中盛荃生也被指控为“没有改造好的右派”，说他“继承了黄药眠的衣钵”。不断地对他进行批判斗争，威胁说要给他重新戴上“右派”帽子，导致盛荃生精神错乱，言行不正常。“革命委员会”主任骂他“他装疯卖傻”并继续批斗。盛荃生由精神分裂症发展成疯子。从那以后直到2005年去世，他的多数日子是在安定医院度过的。

陈老师还列出了该校有七名教职工的配偶在文革中被害死。

于晓岩的爱人齐XX，四十一中校长；
孙静的爱人何XX，外国语学院老师；
邵贞悌的爱人，人民银行干部；
张翰的爱人马特，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方婷芝的爱人高诒善，北京钢铁学院教授；
何世瑾的爱人，北京安定医院医师；
王秉纯的爱人，某小学老师。

女三中一个中学（文革后改名159中学），就有一名校长加四名教员被害死，还有一名教员被迫害成疯子，有七名家属被害死，有至少两名外校人员在校中被打死（该校红卫兵在校外打死的北京居民还未知）。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文革对这个学校，对整个社会，进行了多么残酷的杀戮。

陈寿仁老师说，1960年代初她问过孙历生：“你为什么反党成了右派啊？”孙历生说，她看到了一些内部资料，和人议论了，被报告了，成了右派。陈老师又问：“你为什么离婚啊？”孙历生说：“他要离。我也愿意离，免得影响他。”1966年8月20日上午“斗争”和打死了校长沙坪，孙历生和她都是“劳改二队”的，跪在沙坪的东边。

回顾孙历生的一生，一定会发现她经历了太多的背叛。她加入的党背叛了她，她的第一个丈夫背叛了她，她的同学和朋友（那人文革中当了“革命委员会”主任）背叛了她。但是陈寿仁老师作为一个与她无亲无故的普通历史教师没有背叛她。陈老师坚持写出了真实的孙历生之死，写出了女三中的受难历史。这是浸透了无辜者的血的历史。陈老师也才是一个真正的历史老师。

我和陈老师在网上认识几年后才见到她。她已经年近九十，曾患癌症，但我见到她时，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二十岁，机智，灵活，精神焕发。看到她，让我相信，心里有“真”和“善”的人，外形也会“美”。

6、孙历生之死成为历史“三棱镜”

以上所写，很多是孙历生去世之后发生的事情，围绕着怎么认识怎么看待怎么叙述文革历史发生的事情。我曾把这些称为“历史的历史”。

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孙历生像一个历史的三棱镜，分离出了一些对历史和迫害的相当不同的态度和持有这些态度的人，就像三百年前牛顿用三棱镜把人们认为的“白光”分离成了七色光。对孙历生之死，有坚持回避的于光远，有使用了从“庄子梦蝶”的高雅典故到“父母打错了孩子孩子不应该记恨”的通俗比喻来淡化孙历生死亡血迹的王蒙，有否认孙历生其人存在的美国教授，有坚持想要弄清母亲死亡真相的女儿，有道歉而得不到公布的副总理陆定一，有同命相怜的高云校长，有深深记得她美好形象和气质的郑培蒂老师（她在文革中也遭到残酷迫害，文革后在电视上教英语而给观众留下了美好印象），还有心胸宽广仁慈坚持真理的陈寿仁老师。在这精神的“光谱”上，我们看得到有好有坏的不同的人和价值观念。这是文革造成的社会心态的一部分，也应该是文革历史更深的一部分。

在这个“光谱”的左端上，是最近受到审判的薄熙来。他的反历史行动，实际上也和孙历生相关。

7、薄熙来的反历史行动

1966年，薄熙来是中学生。薄熙来兄妹在1966年8月当了红卫兵，参加了红卫兵暴力行动。这在当时不算特别的事情。实际上，我在调查中没有发现有可以当红卫兵而拒绝当的人，也没有发现没有受过暴力斗争的校长。但是薄熙来后来有了权势的时候做的事情，希望不是老红卫兵中平常普遍的事情。薄熙来邀请了一些北京的中小学教员到他的领地大连过夏天。其中有被他妹妹抄家砸烂了所有东西的老师，有文革后参加追查女三中红卫兵暴力事件后遭到制止而只好中断的老师。“招待得非常好，”一位老师说，“离开时还送给每人一箱礼物，很好的礼物。”对老师的要求呢，就是不要再讲文革的事情。

2000年，一名被红卫兵学生打死的中学校长的儿子和我谈话。第一次谈话很顺。文革一开始，他因为是“革命干部子弟”，当了红卫兵，参加了抄家打人。但是他的母亲是中学校长，很快就被斗争，被关押，被剃“阴阳头”，在“红八月”末被活活打死。他的好朋友的父亲也是一名高级干部，朋友和他一起当过红卫兵，两年后朋友的父亲“自杀”了。实际上这也是文革时期干部子弟中很典型和普遍的遭遇。他谈到这些，也谈到自己母亲之死给他造成的内疚，因为他毕竟也参加过对别人施暴。我和他约好再谈一次。但是第二次他不愿再谈。他说，他告诉了他的哥哥他和我的谈话。他的哥哥要他不要再和我谈。哥哥说应该学习薄家的子女的做法：他们不谈，他们识大体。

薄熙来的母亲在他父亲被“打倒”后，在1967年1月“自杀”了。

这位哥哥表达的意思也很清楚。显然，对文革迫害事实，有着很不相同的看法，而不同的看法来自不同的道德和价值观念，并且导致了对事实的不同说法和做法。母亲的死不见得会使某些人否定文革的迫害原则，对他们来说，重要的只是他们自己有权力控制他人的生死。

正因为如此，历史写作变成复杂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在多层次上观察和记录历史。回顾历史写作中的这些“历史的历史”，请让我在这里再向陈寿仁老师致敬，也再向女三中的文革受难者们表示哀悼。

2013年10月

□ 原载《共识网》2013-11-05

~~~~~

### 【史海钩沉】

#### 中苏“十年论战”是文革的舆论准备

• 吴兴唐 •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发生了一场国际共运大论战，又可称为中苏“十年论战”。对于半个世纪之前的历史事件，为什么现在要来评议呢？

第一，“十年论战”是十年文革的重要原因和思想基础。批判了苏联的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引申到我国国内，打倒睡在身边的“中国赫鲁晓夫”，也就顺理成章了。

第二，中苏“十年论战”，目标是批判“苏修”，但我们国内是把这作为一场“反修防修”的政治运动来对待的，进行全党和全民教育，反对“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

第三，“十年论战”，苏方有错，我方也有错。我方错在“左”，“十年论战”加十年文革，我们有20年是以“左”为指导思想的。

第四，对于十年文革已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出全面否定的结论，而对“十年论战”尚未有全面系统的总结。

第五，近年来有一种文革思潮回潮现象。现在疏理“十年论战”的教训，目的是在于以史为镜，以史为鉴。经常警惕各种形式“左”的思想倾向的出现，坚定“主要是防‘左’”的立场。

本文根据部分史实，对“十年论战”作些探索和评议。评议并非结论，只是表示了作者的一些看法。

#### 一、中苏“十年论战”产生了一系列后果

（一）“十年论战”虽然主要在中苏两党之间进行，但涉及所有共产党。从而促使国际共运大分裂，使国际共运迅速进入低潮。（二）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注意力集中于论战，错过了科技革命带动起来的经济发展黄金机遇期，经济发展滞后。（三）论

战触动了国际格局的变动。中苏关系破裂，美国介入，形成“中美苏”的大三角关系。（四）中共反对苏共老子党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维护了我国国家和民族利益，并使国际共运中的独立自主的思想活跃起来。（五）就中共来说，论战是在“左”的思想越来越发展的情况下进行的。“以我划线”和“以苏划线”，除批倒苏修之外，还打击“一大批”，孤立了自己。（六）我们错误估计形势，认为“帝修反”要联合起来反对中国，因而得出“要准备打仗”的结论。

## 二、我方在论战中的主要“左”倾观点

论战有一个发展过程。论战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算起。当时主要争论集中在斯大林问题上。1960年之后，争论在理论问题和国际共运问题上全面展开。从“二十五条”到《九评》，论战进入高潮。1963年2月23日，毛泽东主持中央常委会讨论苏方2月21日来信，决定由写作班子起草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共中央复信于3月9日发出。3月30日，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发出复信之复信。4月初，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会讨论苏共中央3月30日复信。毛泽东指出，从苏共中央这封长信来看，赫鲁晓夫集团不准修改他们的路线，我们要系统地阐述我们的观点，提出什么是国际共运应当采取的总路线。

6月中旬复信经过两个多月的修改后定稿，于6月17日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标题，由《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这个总路线的建议共有25条，因而也被简称为“二十五条”。

“二十五条”也为《九评》打下了基调。1963年7月6日到21日在莫斯科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会谈期间，即7月14日苏共中央突然公开发表了《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8月初，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会，指出公开信已指名道姓攻击我们，我们也要指名道姓，苏方已公开论战，我们也公开论战。写作班子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常委会的指示，发表公开文章，全面评论苏共《公开信》，因共为九篇，故称《九评》。原来准备写十篇，即十评《公开信》。但是《十评》没有写成，因为赫鲁晓夫于1964年10月14日下台。毛泽东于11月18日召集中央常委会讨论，并指示写作班子起草题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的文章，定稿后于11月21日用《红旗》杂志社论形式发表。

（一）“二十五条”对国际共运总路线、当代世界基本矛盾、战争与和平问题、亚非拉民族民主革命、和平过渡、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兄弟党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这“二十五条”，从现在来看，就是我党要扛起“世界革命”的大旗。“二十五条”批判了苏共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总路线，提出我们党的“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的纲领。在此基础上，到文革时期，提出“世界革命中心转移论”，即认为世界革命中心，由德国转到俄国，现在已转到中国。形成国际共运的“三个里程碑”，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二）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在国内，强调“阶级斗争”，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毛泽东谋求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道路，但从他的激进思想出发，要求“比苏联、欧洲各国搞得更快、更好”，“早些快些进入共产主义”。我们又把自己的实践和经验，以及未经实践验证的做法以至空洞的设想，都视为具有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意义的成功经验。我们自认为这一套东西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和“贡献”。并且希望把这些经验推广出去。

（三）对战后国际形势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缺乏准确的判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过战后10年恢复，在科技革命的引领下，经济有了发展。资本主义从大危机和战争中吸取了教训，改变了完全放任自由的发展模式，代之以带有宏观调控的凯恩斯主义。西方发达国家统治阶层



采取一系列社会改良政策及措施，实行广泛社会福利政策，缓和劳资矛盾和社会矛盾，人民生活有明显改善，社会结构和阶级及阶层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但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依然拘泥于列宁的论断，没有看到资本主义战后的变化。

（四）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论战开始时，我们提出战争的两种可能性和做两手准备的思想。但随着论战的展开，我们对战后社会主义力量作过高估计。把所有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当权派都列入打击的对象。之后，我们又错误估计形势，把新的世界战争描绘得过于严重，说成战争已迫在眉睫，丢掉了保卫世界和平的旗帜。

（五）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道路问题。我们虽然提出过资本主义国家革命道路的暴力与非暴力的两种可能性，但实际上着重批判“和平过渡”的思想。在论战后期，我们离开了两种可能性的结论，强调各国革命武装斗争是革命的必由之路。发展到文革时期，把我国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也说成是“普遍规律”。我们不但批判了苏共的“和平过渡”主张，还批判了意大利和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战后，欧洲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主张不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而是认为可通过“议会道路”或“结构改革”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在论战中公开批判了这些党及其主张。

（六）关于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论战中，我们一如既往地高举支持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的旗帜。但我们思想上依然停留在将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看作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借助力量，支持民族解放与独立运动是为了促进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我们对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的形势和作用估计过高。认为这一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在当时，一系列取得了民族独立的国家，理应将发展民族经济放在首要地位，但我们强调新独立国家面临的最迫切任务仍然是反帝和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政治斗争。

（七）关于国际共运的团结问题。论战初期，我们贯彻“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方针。但随着论战的展开，我们转变为过分强调矛盾、斗争和分化。鼓励和支持同意我党观点的人从“修党”中分化出来另建新党，导致许多党组织的分裂以及大多数共产党同我党关系中断，使我党处于孤立地位。据统计，论战中先后有69个党同我党中断了关系，有来往的仅11个党。粉碎“四人帮”后又有越共等4个党同我党中断了关系，同我党有联系的仅7个党。

（八）关于斯大林问题。中苏论战由斯大林问题引起。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肃反扩大化等错误。由于苏共事先并未向各国共产党作出说明，引起国际共运中很大混乱，给许多国家共产党造成困难。苏共二十大后，中共领导人在同苏共领导人谈话时谈了中共对斯大林功过的看法，并就苏共的做法提出了批评意见。1956年4月和12月，我们先后公开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阐述了我们对于斯大林问题的立场，肯定和赞扬了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错误和个人迷信的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上赞扬了苏共二十大批判个人迷信。但是后来在《九评》中我们改变了态度。《九评》中的“二评”专门谈斯大林问题，“七评”“九评”及《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等文章都涉及斯大林问题。这些文章对苏共二十大揭露和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采取了根本否定和批判的态度。“二评”把苏共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和“反对个人迷信”升级为“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在理论上根本否认个人迷信的存在。这些文章还突出斯大林的个人功绩。说现在“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要保卫斯大林“所捍卫过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些文章是借斯大林问题批判赫鲁晓夫。

（九）关于“资本主义复辟”。批判苏联、南斯拉夫复辟资本主义，是论战的重点。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时刻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把物质刺激、利润原则和强调加强企业管理，统

统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据此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早已复辟，在苏联正在复辟。我们根据我们认为不符合马克思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论述的理解，把不同意我们党观点的共产党统统戴上“复辟资本主义”和实行“修正主义”的帽子。

（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二十五条”中，批判苏共的“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思想，认为社会主义国家那里还存在着企图复辟的旧剥削阶级残余分子，还经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这就表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毫无例外地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1964年7月14日发表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毛泽东对全文作了大量修改，标题也是毛泽东加上的。“九评”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共列出15点，也是在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指导下写成的。在论述15点之后，引了一段毛泽东1963年5月7日的一段批示，也就是在文革时期经常引用的：如果不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这是《九评》“左”倾思想的要害，也是导致发动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根源。

（十一）论战是直接导致发动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文化大革命”是在论战之后接着进行的。其出发点就是“反修防修”，对社会主义社会做出“左”的错误判断，再用这些判断来观察和分析我们党内和国内的形势，得出的结论是：已经形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就睡在我们身边，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在当时的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形成了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和组织路线。对形势错误分析还形成要实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

### 三、当赫鲁晓夫遇上毛泽东

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具有必然性，同时也带有偶然性。其中重要历史人物的个人秉性和作用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在中苏十年论战中，各为一方主帅。抄录几段这两位主帅在论战时的言词，也可作为“十年论战”作些注释。

（一）赫鲁晓夫影射攻击中国“像公鸡那样热衷于战争”。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美后回到莫斯科，第二天飞到北京参加我国国庆十周年庆典。当晚，赫鲁晓夫在我国国庆招待会上发表祝词，影射我国对外政策是不正确地“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的稳定性”。10月2日，中苏两党会谈。10月4日，赫鲁晓夫离京回国。他到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发表演说，影射攻击中国“像公鸡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10月31日，他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不指名地攻击中国搞“冒险主义”，是“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

（二）赫鲁晓夫影射攻击毛泽东是“一双破套鞋”。1960年2月4日，在莫斯科举行华沙条约组织政治协商会议。赫鲁晓夫在闭幕执行会上影射攻击毛泽东，说：“如果一个老头子不明智，等于一双破套鞋，实际上是摆在那个角落里当废品，没有用处”。

（三）毛泽东提出“东风压倒西风”。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毛泽东同赫鲁晓夫以及同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等进行了会谈。在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讲到国际形势时说：“现在我感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毛泽东后来在另一场合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

压倒东风”这句话是《红楼梦》里苏州姑娘“林妹妹”林黛玉说的。毛泽东还列举战后十件大事来说明他的观点。毛泽东的这个说法显然过高地估计了社会主义力量和过低估计了资本主义的力量。

（四）毛泽东说，如果打原子弹战争，极而言之打死世界人口一半，可还有一半人口，还会使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谈到“纸老虎”问题，重提了他在1946年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并引申出“原子弹也是纸老虎”，最后得出这个“极而言之”的结论。苏共领导人借此攻击中共是“疯子”，想发动战争，在“废墟上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本意是，我们对战争的态度是第一反对、第二不怕。从毛泽东当时的看法来说，依然停留在列宁的“战争与革命”的框框中。毛泽东提出的问题是：“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阻止战争。”

（五）从“僧是愚氓犹可训”到“更无豪杰怕熊罴”。毛泽东在论战中写下的诗词表明了毛泽东对苏联态度变化的心迹。1961年10月，在北京演出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郭沫若看过戏后作了一首七律，以示反对苏修。郭沫若七律中隐称赫鲁晓夫是唐僧，“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并称“千刀万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当时虽已展开论战，但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仍是“半个修正主义”，对他要“一斗二帮”。因此1961年11月17日，毛泽东作了一首七律《和郭沫若同志》。诗中写道：“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僧”隐指赫鲁晓夫，“妖”则是美帝。但是到了1962年12月下旬，中苏论战逐渐走向公开论战。毛泽东在一首诗中，把“苏修”同“美帝”共提了。12月26日，毛泽东在自己生日这天作了一首七律《冬云》。“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指当时国际共运形势。“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虎豹”指美帝，“熊罴”指苏修。1963年1月9日，毛泽东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把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比作“苍蝇”、“蚂蚁”和“蝼蛄”。“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指我们对苏修批判的气势。

（六）“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1964年7月发表了《九评》的“压轴篇”第九评。毛泽东很重视第九评的写作，要求总结“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历史教训。文章重点是揭露“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这有两个背景材料。第一个就是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说，苏联已经进入全面开展共产主义社会的时期，“在二十年之内我们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第二个就是“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初赫鲁晓夫访问匈牙利和奥地利的讲话。“土豆烧牛肉”本是欧洲的一道名菜。赫鲁晓夫在访问匈牙利时吃到这个菜觉得十分美味，就对周围的人说，如果人人都能吃到“古拉斯”（即“土豆烧牛肉”菜名），那就到共产主义了。他在奥地利的广播电视演说中又说，共产主义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得到的、盛满了体力劳动和精神劳动产品的一盘餐”。所以说，赫鲁晓夫粗俗地把共产主义看作是“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1965年秋，毛泽东作词《念奴娇·鸟儿回答》：“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七）赫鲁晓夫诬蔑中国人“没有裤子穿，喝清水汤”。1960年6月，赫鲁晓夫在同中共代表团会谈时，攻击中国人“没有裤子穿，穷得要命”。1964年4月赫鲁晓夫连续发表讲话，给中共戴上“小资产阶级倾向”、“新托洛茨基主义”、“冒险主义”、“大汉族主义”、“种族主义”、搞“大小个人迷信”等一堆帽子。赫鲁晓夫说：“中国人没有裤子穿，他们说一个人有一条裤子就够了，他们觉得把自己羞耻的部分掩盖起来就足够了。可是我们这些北方国家，需要更厚实的衣服。否则，我们身体的某些部分可能会冻僵的”。关于“裤子问题”，毛泽东批驳说：在赫鲁晓夫看来，（中国）多几个人，只不过是一堆肉。而且他还说，现在中国是五个人穿一条裤子，大家喝清水汤。其实，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正是他那里裤子太少而清水汤太多的时候，他们日子比我们好过不了多少。他在最困难的时候讲这种话，是为了向他的人民说：“看，我们国家多了不起，裤子不少，清水汤不多”。

（八）毛泽东说论战是打“笔墨官司”，“天不会塌下来”。60年代初，中苏论战越演越烈。但赫鲁晓夫1963年1月在东德党代表大会致词中突然提出各党之间“停止公开论战”。会后，赫鲁晓夫和苏共继续发表反华言论。2月21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并建议举行苏中两党会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苏共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是一个“花招”。1963年2月毛泽东在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时说，我们赞同停止公开论战，但要说清楚，“现在的公开论战，不是我们首先发动的，我们是被攻击的”。他又说，“既然你们已经公开论战，既然你们那样攻击我们”，“索性展开公开论战不好吗？我看，进行这样的公开论战，天不会塌下来，草还是照样长，女人还是照样生孩子，河里的鱼还是照样游”。

#### 四、康生的“窜红”和王稼祥的“被斗”

康生“窜红”和王稼祥“被斗”，都同中苏“十年论战”有关。

论战从内部争议转向公开争论时，1963年2月中央决定成立撰写反修文章的写作班子，位于钓鱼台8号楼，组长是康生。成员有从中联部调去的王力。1966年春，钓鱼台反修文章写作班子宣告结束。但康生、王力依然留在钓鱼台。1966年2月3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经中央指定为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彭真任组长）在钓鱼台8号楼开会。会后拟定了《二月提纲》，主要意图在于把已经展开的批判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和学术范围之内，不赞同把它变为集中的严重的政治批判。《二月提纲》被毛泽东批评后，康生说了谎，说这是彭真等人背着他搞的。于是善于投机的康生，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钓鱼台8号楼由康生、陈伯达主笔，王力等人参加起草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康生由此成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王力借此进入“中央文革小组”。

也正是在论战进入高潮时，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联部部长的王稼祥，面对全党全民“反对帝修反”和“防修反修”的政治热潮，对我国外交在国内经济困难时“四面受敌”的情况深为忧虑，于是写信给中央领导人，建议正确地全面地阐明和确认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和平外交政策；为了争取时间，度过困难，加速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对外有必要采取缓和的方针。

王稼祥的建议，被批判的“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1963年年中之后，毛泽东多次同外宾谈话中批评王稼祥实行“三和一少”修正主义路线。他说：“三和一少”就是“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尼赫鲁）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的援助少一些。”他强调说，我们的方针应该是“三斗一多”，就是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的和马列主义的政党与马列主义的派别。毛泽东对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说，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是“三自一包”，国际纲领是“三和一少”。毛泽东虽一再批评王稼祥的“三和一少”路线，但是，不同意完全公开批判，留有余地。王稼祥只是“靠边站”，而并未撤销他的中联部部长的职务。然而康生就不一样了。1966年6月9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首先向王稼祥发难，在中联部办公区贴出一张《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斗争？》的大字报，把反对王稼祥的“三和一少”斗争，提高到“是反对修正主义篡夺党的领导权的斗争，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的高度。6月21日，康生、王力到中联部看大字报，并在干部会上作报告。康生说，中联部运动方向不对头，“毛泽东思想还没有进中联部的门”，“群众没有发动起来”，中联部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应将“三和一少”的代表人物王稼祥批倒批臭。在康生、王力指使下，王稼祥多次被揪斗。1966年8月的一天，中联部办公区内贴满了声讨王稼祥“复辟”，并要抓其“黑后台”的大字报。中联部干部都感到莫名其妙，很久之后才知道原委。1965年11月，中办主任杨尚昆受周恩来之托看望王稼祥，问是否能做点工作。王稼祥表示同意。一个星期后，周恩来看望王稼祥时，也询问他是否做点工作。王稼祥表示可以做点研究工作。周恩来同意了，并让他再找几个秘书。1966年3月，

中央决定王稼祥任中央外事小组副组长。1966年8月初，伍修权参加中央一次会议，休息时周恩来找到伍修权说：“王稼祥是有过功劳的人，现在身体不好，不要揪斗。”并说：“修权同志，你是了解王稼祥同志的，也了解中央对他的态度，你应该出来替他说话。”第二天伍修权就在中联部中层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了这个精神。但是康生、王力并没有放过王稼祥。在康生、王力指使下，1966年8月12日，中联部一部分人冲进王稼祥的住处进行揪斗。王稼祥从中南海搬出后，住在离北海后门不远的一个单独小院里。这些人拿出一捆大字报，勒令他回答问题。会客厅及内外墙上挂满了大字报。王稼祥当时不知从何答起。于是他们把他押到院子里，站在一块石头上回答问题。要他回答问题的要害是“复辟”。“为什么要复辟”，“复辟的黑后台是谁”。王稼祥瘦弱的身子，在石头上似乎站也站不住。身体虚弱，耳朵不好，开始也未弄清楚什么是“复辟”。后来提问者“启发”地问：“谁到你这里来过？”这时王稼祥才明白他们所指“复辟”是什么含意。他慢慢地说，是中办一位干部来过，问过我能不能工作。一阵口号声后，他还说，我身体不好，但愿继续为党工作，“我愿喝点人参汤预支生命为党工作”。提问者并不满意，一定要他交代中办的人是受谁指使，中间还有谁来过。这时王稼祥明白了他们的意图，他们是要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一再威逼下，王稼祥始终不说，只说：“来过中办同志”，“没有别人了”，“我记不得了”。这时王稼祥几乎站不住了，有人提出不要再斗了，于是就在“打倒王稼祥”的口号声中押回屋里。伍修权得知有人去王稼祥家去批斗时，十分生气，立即通知召开全部干部会议。伍修权在会上说：“你们批判他的错误是允许的，但是应该讲政策，要文明一点，照顾他，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好。”伍修权说，他的这些意见是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讲的。伍修权还根据毛主席曾经提出过的以及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向大家介绍了王稼祥对党的重大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是在苏区宁都会议上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二是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三是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传达共产国际肯定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耿直的伍修权在这次讲话之后就被按照林彪的指示，打成“彭真黑帮分子”。

## 五、邓小平的结论

对于十年文革，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作出全面否定的结论。《决议》对中苏论战有比较简短的一段话，指出论战的“左倾观点的发展就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文革结束之后，邓小平在同外宾的讲话中，多次谈及这场论战的结论是：反对“老子党”，我们反对得对了；论战中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你们有错，我们也有错，我们错在“左”；现在应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一切向前看。

邓小平1983年1月11日在会见墨西哥统一社会党代表团时说：“1957年我参加了莫斯科会议，毛主席是团长，我实际上是副团长；1960年刘少奇同志当团长，我正式名义是副团长。中苏两党会谈我是一直参加的，多数是我当团长，对手主要是苏斯洛夫，他们有他们的一套，我们有我们的一套。现在回过头来看，他们那套东西是不行的，中心就是发号施令，以他们为主。我们有些东西今天回头看也站不住脚。”邓小平1983年1月6日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席希尔的谈话时说：“大论战我们发表了九篇文章，这些工作我都参加了。从现在观点看，好多观点是不对的。”“我们的错误不是个别观点，个别观点上谁对谁错很难讲，应该说，我们的许多观点现在看来还是很正确的。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

邓小平1987年4月30日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中央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说：“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危险还是‘左’，因为‘左’已形成一种习惯势力。”他1987年6月12日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说：“从1957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

邓小平作为论战直接当事人之一，言简意赅地对“十年论战”作了评判，指出主要根源在

于“左”的思想和“左”的习惯势力。这表现了他的政治勇气和智慧。然而，无论是《决议》还是邓小平的有关讲话，都过于简要，而且邓小平有关讲话都是同外宾的谈话中说的。我们没有如总结十年文革那样，对“十年论战”的成因、后果和经验教训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特别是没有对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总结。

（作者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前主任、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 原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9期

~~~~~

【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选载之十五）

• 孙怒涛 •

〔上接 z k 1 3 1 0 a，第七章 4 1 4 的外战和内斗（1967. 6—1968. 9）〕

第十七节 面对这样的一纸毕业鉴定，我欲哭无泪

在两派割据的1967年下半年，即使像下乡夏收这样的事情，两派也是各行其是，组织不到一起。唯有1966届毕业生分配这件事，两派和平地协商解决了。这是因为单独某派无法包办毕业分配，也不可能各派自行分配自己一派的毕业生。毕业生超越派性的共同利益压倒了对政治观点上的分歧。另外，石福庆坚持不懈的努力也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我班的两派势均力敌，团四各占一半。班里的分配工作，我无暇插手也无兴趣过问。所有有关毕业分配的会议和活动，我一次都没参加。

11月底，我班代表414参加分配领导小组的学生党员干部老厉找我谈话，向我宣读了由班毕业分配领导小组写的毕业鉴定。鉴定全文如下：

小组鉴定意见

孙银基同志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入大学后七年半来，有很大进步。

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对“三面红旗”认识比较模糊，但是，基本立场是坚定的。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清理了思想，认识有较大提高。积极参加四清运动。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敢于用毛泽东思想去鉴别、分析一切，在刘邓工作组和保守组织的压制打击下，发扬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较早参加了革命造反组织，坚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比较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一年多来，一直为保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斗。

希望今后在三大革命运动中进一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斗私批修纲，增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增强党性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坚韧性，密切联系群众，在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坚强接班人。

1967、11、25

听到这样的鉴定，我脑袋嗡的一下子就大了，心里拔凉拔凉的。那绝望的心情犹如我不是在听我的毕业鉴定书，而是在听我的政治宣判书。

我这时才知道，要放入我的档案中伴随我一生的竟然是这样一份毕业鉴定书！

我没法否认我在“九评”学习的时候暴露了对“三面红旗”的模糊认识。我也知道“认识模糊”的含义就是目前还不是敌我矛盾的立场问题。我原本以为，三年多前已经做过检查了，这之后我一直在努力改错。我积极参加文革，主要是出于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反修防修，关心国家大事，同时也有改错立功的私心。我认为这几年中，特别是文革以来自我感觉表现不错，在毕业鉴定的时候会放我一马不会再提这件旧事了。但是，我一厢情愿的幻想破灭了。对“三面红旗”的态度本身就是大是大非的重大政治问题，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再次认定我“认识模糊”，那就是宣布我政治上是不可靠不合格的。一般的小事是不会装入档案的，凡是装入档案的东西都不是一般的小事。把一个“认识问题”装入档案袋这件事情的本身，就说明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不仅仅是“认识问题”的政治问题。所谓“基本立场是坚定的”仅是一句多余的空话。

后来我才知道，其他同学的鉴定意见都是正面肯定的。有所差别也仅仅是肯定的语气和用词有点差异罢了。缺点明显一点的同学也是用比较委婉的“希望”来表达。像我这样明确指出在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上“认识模糊”的，在班上可说是绝无仅有。

唉——，我几年前的政治污点现在成了我的历史污点。我走到哪里，只要一查档案，就知道我是一个政治上犯了错误的不可信任不可委以重任的人。这将像一把达摩克利斯剑，永远悬在我的头上警告着我。我今后要在社会上平平安安生存下去，唯一之道就是永远夹着尾巴小心翼翼地做人。或许，这就是组织上要把政治污点记录在案的目的吧？

记得在《水浒传》里有这样的描写：官家对重刑犯要在额上刺字，名曰金印，以示与良民的不同。

时代不同了，宋朝的金印到了现代社会也与时俱进。档案是当政者治民的一大法宝。一个人如果有对党不利的言论或行为，就记录在案。人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如影随形。这根小辫子，想什么时候整就什么时候整，想怎么整就怎么整，主动权永远掌握在执政者的手里，组织的手里，领导的手里。

一生耿直的彭老总，因为上了一道万言书，触犯了龙颜，连同过去的历史旧账一起整，整了个半死，整成反党集团的头子，把国防部长也整丢了。文革期间，1959年的历史旧账连同更年久的历史旧账一起再整，整得一条命都没了。建有丰功伟业的开国元勋尚且是这样的命运，草民呢，更命贱如草芥了。我相信，被档案整得惨不忍睹死去活来的人不在少数。

我默默地听完毕业鉴定，没有说什么。组织的结论，犹如组织的脸色，冷若冰霜。恳求也好，辩解也好，说什么都没有用的。我知道那是不可能再更改的。

我不知道班上那些属于414的党团干部特别是代表414参加毕业分配小组的老历有没有为我争取过在毕业鉴定上不写上这个“认识问题”。尽管我的总部委员头衔有点“显赫”，名气有点大，但是我在这些原来的优质生眼里，不管现在他们是老团还是老四，我永远都是一个差质生。他们永远记得我对“三面红旗”的认识模糊，是一个应该记录在案的政治污点。

我对做不做总部委员，做不做革委会委员，都无所谓，但是我对毕业鉴定是非常在意的。现在这样的鉴定结论，对我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一个对我的前途、命运的极大打击，甚至是一个难以向朋友派友启齿求援的打击。我情绪十分低落、郁闷，灰暗的心情一直挥之不去。随着对文革越来越迷茫，对派性斗争越来越厌倦，对自己的前途越来越没有信心，我的表现也越来越消极了。要不是414头头那份无法逃脱的责任感，我真的想做一个我以前所不屑的逍遥派了。

唯一使我有点安慰的是，幸亏我没选择去《新华社》当记者。没去，不仅是有点自知之明，简直是有点先见之明了。要是拿着这样的毕业鉴定到《新华社》报到，除了被打入冷宫，或者日后被清理出党的要害机关，我不会有其他的前途，更不会有有什么作为的。

第十八节 周泉纓的《必胜》，搅得4 1 4一地鸡毛

1、《必胜》及《炮打》的出笼

1967年8月9日，周泉纓写了一篇《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大字报贴在礼堂前的大字报区。

“四一四思潮必胜”，这是我们已叫喊了好几个月的口号，并不新鲜。那时，凡是参加4 1 4的老四，都相信有一个四一四思潮，都坚信四一四思潮是必胜的。

用“四一四思潮必胜”作为大字报的标题，我见到过的也不只这一篇。

《必胜》的署名不是周泉纓，而是用了“东方红战团一支队”这一化名，并不引人注目。

也就是说，本来，这样一篇大字报很有可能淹没在大字报区数百上千大字报的汪洋大海之中，与众多其他的大字报一样，自生自灭。所谓“这大字报贴出去后的第二天，清华园内就如引爆了一颗原子弹”只是大字报作者美好的想象。

如果说这篇大字报还有一些特别的地方，表面上看，有这么三点：一是篇幅很长，二是林林总总讲了不少观点与话题，三是用了许多伟人语录，引经据典，貌似很有理论性。

大多数人，不管老团老四，粗粗一看这大字报，很有可能没看完就掉头走了。我就是非常粗略地跳着瞟过一遍，没看仔细，也没耐心看完。

我以前一直以为《必胜》是周泉纓一个人写的。后来风闻他征求过一些人的意见。看了他写的《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一书后，才知道了《必胜》的创作过程。他是这样叙述的：“我只用了三四天时间就完成了《四一四思潮必胜》初稿……我将《四一四思潮必胜》初稿交给了我信任的清华干部罗征启，请他对《四一四思潮必胜》初稿提出意见并进行修改……罗征启……第二天就把他修改后的《四一四思潮必胜》终稿送回给我……罗说他对文章没有作什么修改，只……润饰了一下这段文字……我请……万润南……为《四一四思潮必胜》终稿提意见……就这样，《四一四思潮必胜》就正式定稿。”

《必胜》贴出以后，团派中对论战感兴趣的一些人从中嗅出了不同寻常的气息，因此对它进行猛烈批判。“三七战团”的一部分战斗组对《必胜》也严重不满。

如果像往常一样，一方口诛笔伐地声讨一阵子，一方不再回应，那么这个热点话题过几天也就过去了。1967年的夏秋，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大事件此起彼伏、层出不穷，清华园内也每天都有新鲜的话题。两派不会在《必胜》上无休止地纠缠下去的。

正当对《必胜》的批判慢慢退潮的时候，周泉纓来了一个更大的惊人之举：炮打陈伯达！

1967年9月14日和17日，周泉纓以“清华大学4 1 4伟大转折纵队一支队”的名

义连续发表了《重炮猛轰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袁世凯式的人物——陶铸》及《评陶铸之流 1967年6月重版的一篇文章》（简称《炮打》），矛头所向，直指陈伯达。第二篇文章上署了周泉纁的名字。

即使是不指名的炮打中央首长，对本人，对所在的红卫兵组织，都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严重大事。消息马上就传到江青的耳朵里。第二份《炮打》贴出的当晚，在有414头头参加的中央首长接见会上，江青发话了：“今早在清华礼堂前贴了一张陈伯达同志大字报，说陈伯达同志是篡夺群众运动成果的野心家。（贴大字报的人）叫周泉纁。周泉纁，小丑！叫这鬼名字！欺负老实人，欺负到中央文革头上。”谢富治马上接腔说“抓起来，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其时，正值团四两派在商谈大联合。周泉纁的炮打陈伯达既陷414于极度的被动之中，也毒化了大联合的气氛。

团派根据江青的讲话把周泉纁定性为“反革命小丑”，根据谢富治的指示要抓捕他；以“三七战团”为代表的414群众因为“炮打”是严重的政治问题而声讨他；“东方红战团”的一部分头头以中央还没定性周泉纁是反革命为由竭力庇护他。直到10月19日，以为风声已过不老老实实躲着的周泉纁终被团派抓住扭送到北京市公安局。将近一年后的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在召见五大领袖时候下令释放周泉纁。

又过了四十多年，万润南在校友网上抖出了一个有关《必胜》的爆炸性旧闻。万润南质问周泉纁：“《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文章，里面有一个字是你写的吗？”万润南接着说：“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这篇文章的‘文字’，前三段的每一个字，出自我的笔下；后两段的每一个字，则是老罗所写。参加构思、讨论，并提供了一部分列宁语录的，是李兆汉，当年清华党委宣传部的一位老师。”

这一下，捅了周泉纁的马蜂窝。周泉纁立即宣布与罗征启、万润南绝交。

我对万润南的话，大部分是相信的，那就是《必胜》是周泉纁、罗征启、万润南、李兆汉这几个人一起策划、构思、讨论、写作、修改，集体创作完成的。至于万润南反问周泉纁“里面有一个字是你写的吗？”这话好像说得有点太绝了，似不可全信。我知道，周泉纁是一个既有思想、也有文笔、很有个性的人，在《必胜》的创作过程中不可能如万润南所说的那样碌碌无为到连一个字都没有写的程度。

万润南之所以爆当年的内幕，并非是用来抢《必胜》著作权来的。他说：我“无意改写清华的文革史。《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文章，当时由周泉纁署名，而且也由他承担了全部责任。所以，其作者，当然是周泉纁。”万润南这样说，是客观的，公正的。我也认为，无论周泉纁具体写了多少，罗征启、万润南具体改了多少，整篇文章的思想是代表了周泉纁的。所以我认为，即便极而言之，如万润南所说周泉纁没写一个字，《必胜》的著作权还是应该属于周泉纁的。周泉纁署名了，被抓起来坐牢了，他没有把罗征启、万润南等“共犯”咬出来，这种骨气我还是很佩服的！

万润南之所以要这样说，这样做，是因为万润南认为周泉纁被毛泽东“钦定”为“理论家”后，这《必胜》“就变成了一块痰，让你痰迷心窍了一辈子。……对我们而言，是往事一段；对你而言，是一生的辉煌。……（所以，）我索性大喝一声，在你背上击一猛掌，帮你把这口痰吐出来，也许，你的心智就正常了。”

对这点，我非常认同万润南对周泉纁恰如其分的看法。周泉纁确实是“痰迷心窍”了。万

润南的好心，本想是为周泉纓“治病”。只是没想到“药”用得太猛了，“病”没治好，“医生”与“病人”却成了仇家，令人扼腕叹息。

周泉纓、罗征启、万润南这三位都是清华的大名人，都有不平凡的坎坷人生。几十年生死相交的朋友情谊被这件事情破坏了，反目成仇，大家看着，无比痛心。但愿他们以后会有握手言和的那一天。

2、团派对《必胜》的态度

《必胜》出笼以后，团派并没有立即形成对《必胜》批判的高潮。大约过了十天左右，对《必胜》的批判才多起来。很可能，那几天他们正在仔细地研判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和背景。

我一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让团派对这张大字报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以至要倾其全力大张旗鼓地将其批倒批臭。

《必胜》之所以被团派高度关注，我猜想可能有这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它比较集中地表达了四一四思潮的部分基本观点，引用了不少马列语录，更显得有理论深度。这引起了有同样理论论战欲望的那些老团们的兴趣。二是有些尖端的观点比较容易被抓住尾巴，况且还有一些不合事实的叙述（如“4 1 4派几乎都是最早从白色恐怖里杀出来的造反派，她的历史最久，在刘邓血战中功勋最大”），批驳这种有明显破绽的文章更容易取胜。三是可能已经知道这是“东方红战团”的重要人物写的。好些尖端观点并不为4 1 4多数群众所接受。那么批《必胜》就是只打击“东方红战团”，对4 1 4的杀伤力最大，而引起4 1 4群众反弹的副作用最小。

大概从8月20日开始，团派掀起了一场围剿《必胜》的浪潮，“团广播台举办了《批判四一四思潮必胜》专题节目”。

8月26日的团派“井冈山报”上，用十个版面的篇幅发表了两篇系统批驳《必胜》的文章。《必胜》作为反面教材也刊登在这期专刊上，于是“流毒”全国，并让经常阅读《井冈山报》的毛泽东也看到了此文。没有团派“帮”周泉纓“炒作”，《必胜》的命运也就是自生自灭、销声匿迹。对此，周泉纓是承认的、感激的。他说：“事实上从《四一四思潮必胜》被团派批判以后，我确实成了文革的名人，为此我一直感谢蒯大富和他领导的团派。”

实事求是地说，撇开政治观点和派性语言不说，团派这两篇批驳《必胜》的文章同样写得很有理论性、针对性、逻辑性，写得很精彩。在4 1 4中，能写出《必胜》这样有分量有水准的文章，少说也有七八人。团派里面同样也有那么多人写得一手好文章。

两篇批驳文章中，重点的一篇是由“天安门纵队”的“第一湘江”、“轮机兵”、“不怕鬼”等10个战斗组联合写的。这对我真的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我领导的“天安门纵队”已经在3月初解散了。“4 1 4串联会”成立以后，我以原“天安门纵队”为班底，成立了“三七战团”。4 1 4分裂成立总部的时候，“三七战团”所属的战斗组也发生了分裂。多一半的成员跟着我和汲鹏到了4 1 4总部，少一半的成员留在团派总部。留在团派里的这些成员没有散伙，他们依旧以原来战斗组的名字进行活动，于是就有了“团记”的“第一湘江”、“团记”的“轮机兵”等。这些“团记”的战斗组集合起来，重新捡起了“天安门纵队”的名号。只是4 1 4的“第一湘江”、“轮机兵”等属于“三七战团”，团派的“第一湘江”、“轮机兵”等属于“天安门纵队”。于是，清华就出现了名称完全一样但是分属两派的两个“第一湘江”、两个“轮机兵”等有趣现象。这与4 1 4占用“井冈山兵团”的名号相类似。他们用着“天安门纵队”和“第一湘江”等名号，可能也有一种“妙不可言”的感觉吧？

另一篇批判文章是由“6 2 4战团”的“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等7个战斗组联合写的。文章指出，《必胜》宣扬的就是“团派冲锋陷阵打江山，而4 1 4掌权坐江山”的观点。应当说，团派的政治嗅觉是很灵敏的，批判也是一针见血，抓住要害的。只可惜这一要害没有被当做要害重点展开批判，也没有上纲上线到“造反派打江山不能做江山”、“无产阶级打江山不能坐江山”这样的理论深度和政治高度，而是淹没在“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无产阶级阶级路线”、“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等一大堆其他罪名的批判里，因而显不出这就是《必胜》的要害了。

在上半年干部问题的论战中，团派一直处于下风，十分被动。这一次，抓住《必胜》这个4 1 4自己送上门来的反面教材，又有“天安门纵队”这批很能写的秀才助力，团派对它的批判，用“铺天盖地”、“狂轰滥炸”这样的形容词，一点也不过分。这次团派狠狠地出了一口恶气。

在周泉缨炮打陈伯达以后，团派除了继续狠批《必胜》外，就是要想方设法把周泉缨这个“反革命小丑”扭送到公安局里去专政。由于沈如槐的庇护，这一目的一直没有达到。直到一个多月后，团派才逮住了机会，如愿以偿。

3、我与“三七战团”对《必胜》的态度

这里我先谈一下我与周泉缨此时的关系。

在4 1 4总部成立以前，我仅仅对他观点有时比较偏激、“尖端”有一点看法，其他方面我对他的印象还是相当好的。他思想敏锐、视角独到、观点新颖，这些都是我所欣赏的。关系尽管不算密切，但是互相尊重，尚能友好相处。不过，在对团派的看法上，分歧已经很明显。他认为我对团派抱有幻想，我认为他对团派过于极端。

4 1 4总部成立以后，随着交往的增多，对他的看法也更多了些。他的性子比较爽直，脾气有点急躁。他很自信，甚至显得有点自负、自大，总认为自己观点是正确的、革命的。所以，在总部会议上，有时候他与别的总部委员争论起来，他会大声呵斥，指着别人的鼻子责骂“老机”。我亲眼看到过他这样对待魏洪波老师，我也亲身领受过他这样的指责。这当然让我心里很不爽。我想，即使在团总部里，我也没受到过这样的“礼遇”啊！我对他这样粗暴的态度和盛气凌人的作风很不满意。记得有次因吕应中问题我去2 0 0号9 5开座谈会，上车以后才发觉我与他同在一辆车上。我们彼此形同陌路人，谁也没有主动打招呼。我与其他总部委员，与“东方红战团”的其他负责人都有良好的个人情谊，唯独与周泉缨，始终没建立起来。但是，不管怎么说，在《必胜》发表之前，我与他的关系只是疏远，并没有恶化到公开对立的程度。

贴在大字报区的《必胜》，我跳跃式的粗看过一遍，没什么特别深的印象。因为此后团派连篇累牍地批判，我想知道团派为什么要那么大力鞭挞《必胜》，才仔细地研读了一次。

我对《必胜》的内容大致分了三个部分：

一部分是我赞同的。尤其是第一段“阶级关系的变化”阐述的十七年“红线主导”论及其“部分改善无产阶级政权”的观点。这些观点，经过几个月的团四论战，已经成为4 1 4群众的共识。《必胜》只是把这些共识重复了一遍，叙述得更有条理性。就实质内容而言，在我看来并无多大的新意。

另一部分是不熟悉的。如军区问题，“河造总”问题，全国各地两派是不是有规律可循的问题。这部分我无法表态。

还有一部分是我不赞同的，那就是对团派的态度。认为团派只是在对付主要敌人的时候利用他们的力量“划几浆，然后当他们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彻底暴露本来面目时候，毫不犹豫地将他们打落在水中”，用铁的手腕把他们捏得粉碎。这种极端的观点是我不能接受的，这种偏激的用词也是我所反感的。

“三七战团”与“东方红战团”的共同目标是反对团派的极左思潮。但是，在“东方红战团”里像周泉纓等人，已经偏激到团派等同于极左派，把蒯大富看成是变质的、落伍的、必须抛弃的红卫兵头头，这与我反对团派、对蒯大富的认识和估计是有很大差别的。就说蒯大富，尽管他犯了很多错误，现在还在继续犯着越来越严重的错误，但是他毕竟很年轻，掌权的时间很短，经过挫折，只要他吸取教训，他会成熟起来的。那些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刚参加革命的时候，也是比较幼稚的，也是犯过许多错误的。中间有很多人被历史淘汰了，但是留下来的是真正经历过考验而成长为革命家的。为什么青年学生在这样的文化大革命中不会出几个真正站得住脚的学生领袖呢？

我赞同的部分，也就是“三七战团”与“东方红战团”结盟的思想基础。我不赞成的部分，也就是“三七战团”与“东方红战团”的主要分歧之一。对于这样一篇我基本赞同又有部分不赞同的大字报，我是不会公开批评的。

沈如槐用《千钧棒》战斗组的名义发表过“平保”、“平黑”等的观点，我对其中有些论述也有所保留的。4 1 4 战斗组出的大字报，甚至“三七战团”一些战斗组出的大字报，有些我也有不同意见。这就得包容。听听别人的观点，对的就吸收，不同意又不是原则分歧的，用不着公开争论。另外，对有些观点我也不是很自信，也在不断地思考和琢磨，在消化完善的过程中。即使是团派的大字报，要反驳的观点太多了，绝大多数也是看过就完了，只有认为很重要的，才找合适的时机批驳一下。

“三七战团”多数同志对《必胜》的反应，比我要激烈一些。

比“三七战团”反应更强烈的是4 1 4中那些既非“东方红战团”又非“三七战团”的大多数中间群众以及总部委员中的教师、干部。这些都是温和的老四。他们认为周泉纓的观点太右了，4 1 4不能越右越好，越走越右。

时值沈如槐外出。在我主持的总部会议上，主张批判《必胜》与不主张批判《必胜》的意见尖锐对立，相持不下。“4 1 4内部“东方红战团”与“三七战团”在《必胜》问题上发生争执，“三七战团”倾向于批判，为了统一思想，昨天到今天（8月21日）开了一天半会。”我不主张过于屈从于团派的压力。我认为4 1 4的主要精力还是应该放在大批判上。8月22日晚上，“4 1 4总部发表关于《团总部某些人借批判〈四一四思潮必胜〉大字报攻击4 1 4的声明》。说：目前的任务是批刘、邓，要坚持大方向，坚持大批判。……为了坚持大方向，防止内战爆发，对团总部这种行为暂不予以还击，并劝他们迷途知返。”

过了二天，““东方红战团”核心组发表声明，认为‘《四一四思潮必胜》大字报完全正确’。‘三七战团’发表了一个《批判“东方红战团”声明的声明》”。就这样，“三七战团”与“东方红战团”的矛盾完全公开化。

“三七战团”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组织。以“三七战团”名义写的大字报、声明之类，少数

是我预先看过的，多数可能知会一下大致的情况，还有一些并不见得都告诉我，高季章、王允方等几个主要成员商量过以后就贴出去了。在周泉纓炮打陈伯达之前，我本人对《必胜》的态度一直是比较克制的。

对于以“东方红战团”核心组名义发表的声明，沈如槐说：“我估计，这是周泉纓在唱独角戏。”我想也是。因为这期间“东方红战团”的核心几乎全都外出了，只留下宿长忠。而宿长忠对《必胜》也是很有看法的。所以周泉纓实际上是以“东方红战团”的名头发表了一份自己支持自己的声明。这点我可以理解，因为毕竟周泉纓也是“东方红战团”的负责人之一。

沈如槐还说：“我在武汉接到北京电话，……说4 1 4总部发表了关于批判《四一四思潮必胜》问题的声明。我离京外出调研期间，在家主持工作的同志做出这样重要的决策居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对此，我大为光火。”

这我要辩护一下。我主持总部会议，发表的是“坚持大方向，坚持大批判”的总部声明，而并不是批《必胜》的声明。即使发表了批判《必胜》的声明，只要是依照大多数留校总部委员的意见作出的，也是无可非议的。至于请示或征求一把手沈如槐的意见，主观上说，我当时没有这样的观念。既然“帅”在外，那么“在家主持工作”的“将”顺理成章地独行其令了。客观上说，沈如槐去外地并没有做正式的工作交代。我连他去了哪里都不知道，更不知道怎么与他联系。我即使想请示也无从请示。说句实话，我也没向可能知道沈如槐行踪的宿长忠打听一下。沈如槐之所以大光其火，关键是因为总部发表了一个他不满意的声明。这点也好理解。

当时学校里是这样一种混沌的形势：团派借批《必胜》试图压垮4 1 4，自不待说。“东方红战团”内部虽然有意见分歧，但是基本倾向是支持《必胜》的，这也比较明确。“三七战团”的大多数人都主张公开批判《必胜》，并且贴出海报要在大礼堂以“三七战团”的名义召开批《必胜》的大会。这得到相当一部分4 1 4干部、群众的支持，也引来另一部分干部、工人的担忧和反对。他们找到我，说4 1 4内部批一批就可以了，公开批，只会让团派从中渔利。还有的说，你们小将闹矛盾，最后我们工人倒霉。他们要我力阻这个批判大会。而周泉纓则给沈如槐打电话，对他说什么“4 1 4内部搞政变。你回来迟了，权就要被人夺走了！”这样耸人听闻的假消息，把一潭已经浑浊不堪的浑水搞得更浑。面对这样一个纷乱的局面，既要坚持反极左防极右的原则，又要不危及4 1 4的生存，这已经超出了我的处事能力了。左右为难之中，我力劝“三七战团”先别开大会批《必胜》。

我对《必胜》态度的彻底转变是在周泉纓炮打陈伯达之后。作为一个总部委员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要员，不仅周泉纓自己极有可能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抓起来，4 1 4也必定受其牵连，甚至可能被定性为反动组织。那样，4 1 4就真的完蛋了！我一直坚信，团派的高压政策压不垮4 1 4，但是4 1 4内部激进分子的极端行为会葬送4 1 4。这是我最担心的。可以说，我此时对周泉纓已经全无好感，我彻底被周泉纓惹火了，简直是怒不可遏。我甚至怀疑过，周泉纓是不是老团派到4 1 4来卧底专门来搞垮4 1 4的奸细？我认为，周泉纓对4 1 4的杀伤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团派！

到这个时候，我坚决主张狠批《必胜》，狠批周泉纓。因为：

- 1、周泉纓的性质已经变了。他是一个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小丑”，是严重危害4 1 4利益的败类。我心里已经把他从同志、战友的名单中，从4 1 4的队伍中开除出去了。必须要与这样的人划清界限，他的《必胜》当然必须批判。

- 2、《必胜》已经远播校外，我十分担心社会上看到了，特别是上层看到了，误以为这就是四一四思潮，误以为这就是4 1 4的主流观点，那就糟糕透了。我必须发出强大的声音：《必胜》

不代表大多数 4 1 4 群众的观点，在 4 1 4 里面大多数的人都是反对《必胜》的。

3、《必胜》里确实有我不赞同的内容，而且《必胜》里确实有一种右的倾向。团派的极左思潮是主要的危险，必须全力批判。以周泉纓为代表的右倾思潮对 4 1 4 也是危险的，趁这个机会也要好好的批一批，防止 4 1 4 因为批团派的极左而自己滑到极右。

我和“三七战团”批《必胜》，还有这样的想法：既向团派显示“三七战团”并不同意《必胜》的所有观点，与“东方红战团”是保持着距离，又向“东方红战团”表示，尽管“三七战团”与你结盟了，在原则问题上“三七战团”还是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是要发出不同声音的。

我和“三七战团”真的要批判《必胜》、批周泉纓的态度，引起沈如槐的极大不满。对此，我是有思想准备的。在当时，周泉纓是“东方红战团”的一个核心成员，是与沈如槐关系最密的战友。沈如槐要全力庇护周泉纓，全在情理之中。

非常令我意外的是团派对“三七战团”批《必胜》、批周泉纓的反应。“三七战团”真心实意地批《必胜》、批周泉纓，却引来团派中极端分子对“三七战团”的反批判。他们认为我们是在搞“假批判、真包庇”，这让我真的是哭笑不得。团派总部委员陈育延在她 9 月 1 8 日的日记中记下了这样精彩的一幕：

“在大礼堂里，4 1 4 的“三七战团”召开大会批判 4 1 4 的周泉纓。团派战士大批拥进了礼堂。我们的发言比 4 1 4 还多。这里虽然是孙怒涛们主持会场，但是任传仲、倪旭生却活跃在舞台上。团派战士的发言就其内容来讲当然比 4 1 4 的尖锐和泼辣得多。但就其效果来讲，适得其反。因为团派发言一致认为此“三七战团”召开的大会是假批判，真包庇，孙怒涛是两面派。把周泉纓与 4 1 4 头头与其思潮串联起来。可以说，他们的发言派性很强，有些过左。于是这个毛病就被右派利用，孙怒涛等人一再煽动 4 1 4 战士与团派的对立情绪，说什么：‘我们是真批判’，‘决不许假借批周，把矛头对准广大 4 1 4 战士’（真活见鬼，是骂孙本人，他却把矛头转成了骂 4 1 4 战士，狡猾！）结果可以说，这次会议团派失去了自己的团结对象 4 1 4 中的偏左者——“三七战团”。会议最后发生了抢话筒事件，结束是老团结尾的。整个大会的调子是激烈的……”

这段日记写得很传神。我要再补充一点的是：任传仲、“狗熊”等人气势汹汹地冲向主席台，台下的老四想挡也挡不住。主席台上混乱不堪，主持大会用的话筒也被老团抢去。我气得一跺脚也离开了会场，心里恨恨地想，既然我是假批判，那就让你们老团真批判去吧！

关于这次批判大会，有一点是陈育延在那个时候所不知道的。这次批判会是我在总部会议上逼着沈如槐同意召开的。也就是说，这次大礼堂的批判大会是以 4 1 4 的名义而不是以“三七战团”的名义召开的。沈如槐在大多数总部委员的压力下不得不同意开批周泉纓、批《必胜》的大会。但是他心里是不情愿的，行动上也就不会支持。我依靠“三七战团”召开并主持了这次大会，到会的总部委员也只有汲鹏等人，“东方红战团”的头头一个也没有到会。没想到好不容易开起来的大会又被团派的激进分子所冲垮。我想沈如槐在暗中也窃笑不已吧？我与“三七战团”犹如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在 4 1 4 内部，被沈如槐批评；在外面，又被团派批判。两边都不落好。

几十年后，我看到了周泉纓对“三七战团”批《必胜》的反应。他能料到中央会批他，团派更要批他，但他没想到 4 1 4 内部也有人要批他。“至少在其规模和级别上，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那是因为周泉纓当年小视了“三七战团”，至今仍然没有弄明白当年“三七战团”为什么要狠批《必胜》。

(未完待续)

□ 摘自《良知的拷问》(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2月第一版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 获取

中文文件: 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